

辽朝政治中心研究



肖爱民
著



人民出版社

辽朝政治中心研究



肖爱民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朝政治中心研究 / 肖爱民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01-014111-4

I. ①辽… II. ①肖…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辽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9121 号

辽朝政治中心研究

LIAOCHAO ZHENGZHI ZHONGXIN YANJIU

肖爱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7-01-014111-4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1946年9月至1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任系主任。1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1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壁、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全国宋史界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2005年以来，又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成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2009年1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成立，本学科获得空前大的支持力度，迎来更新更好的发展机遇。2011年全国学科调整后，中国史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世界史、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另有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宋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的关系是“各自独立，资源共享，密切合作，共建历史学科”；目前共有在编教职员工70余人，下设“三系七所”等教学研究机构。在继续编印《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和《宋史研究丛书》的同时，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成员除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外，主要有：郭东旭、刘敬忠、郑志廷、汪圣铎、张家唐、闫孟祥、刘秋根、刘金柱、吕变庭、杨学新、雷戈、肖爱民、肖红松等先生。

研究历史，教书育人，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天职。

不吝赐教，日新月异，臻于完善，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对本学科的长期厚爱和支持。特别鸣谢人民出版社对《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的鼎力襄助。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 北 大 学 宋 史 研 究 中 心
河 北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姜锡东 成员：王菱菱、范铁权、丁建军

序

肖爱民的《辽朝政治中心研究》即将付梓问世，嘱我作序，却之不果，勉为之“絮言”。

这是肖爱民博士毕业后10年中的第二部专著，与第一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都是探讨游牧政权体制的专著。对于中国北方游牧部族政权体制的研究，是我多年来从事蒙元史和契丹辽史研究中长期关注的课题，积累了一些资料，产生了一些新认识，形成了一些新观点，也曾就相关问题发表过几篇论文，进而有过申报国家科研项目的行动，希望与本单位几位从事北方民族史教学与研究的同事共同完成对游牧政权行国体制的研究与考察。但由于种种原因，申请两次皆未获通过。后来，则把希望寄托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方面，如果有机会招收三五届博士研究生，每届招收两三人，每人研究一个相关题目，也可以对行国体制诸方面内容有一个系统全面的初步探讨，为今后更深入、更全面系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然而，天不遂人愿，博士生招收计划也屡次受阻，直到2000年才争取到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2001年获准招生。肖爱民就是当初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一书，就是他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的成果。

肖爱民爱读书、会读书、勤于读书，有着自己特有的学术敏感性。他总能从阅读中找到被别人忽略、回避或未能发现的资料和问题，从而找到别人未曾注意到的资料，并以其尖锐的目光、敏锐的洞察力确定研究的方向、内容与课题。同时，他还善于接近群众，能够深入到普通牧民中，进行调查研究，

向他们学习,从中吸取营养,受到启发,直接获取学术灵感,用今天常用的语汇,就是接地气。这使得他的研究既有来自古籍文献的丰富资料,又有来自社会实践的鲜活内容。

游牧政权即中国古典文献中所称的“行国”,与中原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即所谓“城国”,是我国境内不同民族或部族政权分别采用的两种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自汉匈对峙以来,直到清初,延续了将近两千年。两种体制既有其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相得益彰的发展历程,也有其对立、摩擦甚至对抗的经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点日益增加,相异处也渐被理解和适应。对两种制度和体制的研究,不但是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能为今天各民族间的团结、进步和共同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或忽视对游牧政权的研究和关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就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因此,在对中原王朝中央集权体制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游牧部族政权“行国”体制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辽朝政治中心研究》是对“行国”体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代以来,就有学者在研究中或直接或涉及了这一问题,顾祖禹以皇都、中京为都城的表述虽未直接指出两地为辽朝前后的都城即政治中心所在,但将它们确定为辽朝政治中心的意向是明显的;此后的谭其骧等学者,更进一步阐释了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和理由,也得到了部分当代学者的赞同。

傅乐焕先生在其博士论文《辽代四时捺钵考》中也进一步指出辽朝五京并非其“政治中心之所在”,其“政治中心……在游牧式的捺钵”;陈述先生在其《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姚从吾先生在《辽朝契丹族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一文中,对契丹人的捺钵文化从军事、政治和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明确指出捺钵是辽朝“国政实施中心”。此后,这一结论更为一些治契丹辽史者所接受。

然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学者们追求真相的精神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到20世纪90年代，杨若薇在其博士论文中，接受并发展了傅、陈、姚诸先生的观点，进而确定“行宫部落无疑是辽国政治中心——拥有最高权力代表者皇帝和全国实施统治的中央政府”，辽朝的政治中心“在游动的斡鲁朵中”，并对此做了大量的论述和考证，指出行宫——斡鲁朵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内容的丰富、惊险和波澜壮阔。至此，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好像已经尘埃落定，从捺钵到行宫——斡鲁朵的结论已经达到了问题的核心，似乎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结论了。但是，学术研究中对问题结论的孜孜追求，永无止境，鼓励着学者们不断奋进，力争使研究之箭直指问题的靶心。于是就有了肖爱民的《辽朝政治中心研究》。

他在书中总结学界对辽朝政治中心的三种观点，加上书中提出的共有四种观点：京城说、捺钵说、行宫说和本书所主张的行朝说。分析四种意见，大致应分为两类：京城说自为一类，其余三种意见的方向是一致的，属同一认识的不断深化，日益完善，直至最终正中鹄的。学术研究就是遵循这一规律前进的，在不同观点的切磋中寻找方向，对正确方向的研究不断深入，直至最后得出正确、准确和无以撼动的结论。

综观京城说与行朝说两类观点，分析两者分歧之根本，则在于前者在视角、研究思路和考察方法上，忽视了游牧社会和“行国体制”本身的特点，而以中原郡县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研究的参照，着眼于辽朝“胡汉分治”中的汉制一面，忽略了游牧社会传统的“行国”体制一方。而辽朝的汉制，是在行国体制下管理汉人与其他定居农业居民的制度，它与中原地区完整的多年来一脉相承的汉制又不完全相同，片面地将辽朝治理地区农业人口的五京和在与中原交往中地位和作用相对突出的中京分别确定为陪都和京城，同样也忽略了辽朝汉制本身与中原传统制度的微观差别。所以，在对游牧政权的研究上，需要转换视角，重点考察游牧社会的传统和制度的传承，参照自匈奴以来直

至大蒙古国的制度，找出它们继承与发展的脉络，才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而对辽史研究中，还应注意它的汉制与中原地区汉制的某些差异，时移事异，完全照搬中原制度的原版难以做到与事实毫无出入。

相对于对大一统王朝和分裂时期中原王朝的研究，对边疆和游牧政权行国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需要治民族史、边疆史的学者和广大有志于此的人士奋发努力，刻苦钻研，关注中国历史研究中这一薄弱环节，以使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更丰富，更全面，更生动，更具体，更催人奋进，更能让我们从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历史行程中吸取营养，从而调动各族儿女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贡献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是伟大时代赋予今天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桂芝

2014年10月15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中原城国与北方行国的政治中心 / 13

- 一、行国与城国的释义 / 13
- 二、中国古代中原城国的政治中心 / 16
- 三、中国古代北方行国的政治中心 / 23

第二章 辽朝五京的建立及其地位和作用 / 45

- 一、辽朝五京设置的渊源 / 46
- 二、辽朝五京设立的经过 / 47
- 三、五京的地位与作用 / 50

第三章 契丹皇帝的四时捺钵及其性质与地位

——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谈起 / 61

- 一、关于“四时捺钵”的记载及捺钵释义 / 62
- 二、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 67
- 三、辽朝契丹皇帝“四时捺钵”的性质 / 71
- 四、辽朝皇帝“四时捺钵”的地位 / 74
- 五、“辽内四部族”跟随契丹皇帝四时捺钵原因探析 / 76

第四章 辽朝人对本朝政治中心的认识

——以辽代的石刻文为中心 / 83

- 一、五京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 84
- 二、辽朝人意识中的国家政治中心 / 86

第五章 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 / 91

- 一、北宋人所认识的辽朝特殊社会面貌 / 92
- 二、四时捺钵是契丹皇帝适应自然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 / 94
- 三、上京、中京、南京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 96
- 四、行宫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 99
- 五、北宋人意识中的辽朝政治中心 / 101

第六章 辽朝斡鲁朵的含义、性质与地位 / 107

- 一、关于斡鲁朵的语言学研究 / 107
- 二、辽朝斡鲁朵的含义 / 113
- 三、辽朝斡鲁朵的性质与地位 / 123

第七章 辽朝宫、行宫的含义、性质与地位 / 125

- 一、中原宫与行宫的含义 / 126
- 二、辽朝宫与行宫的含义 / 129
- 三、辽朝宫与行宫的性质与地位 / 137

第八章 行朝

——迁徙移动的朝廷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 141

- 一、关于辽朝政治中心的综合分析与研究 / 141
- 二、行朝——迁徙移动的中央政府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 149
- 三、辽朝政治中心行朝的写真 / 151

参考文献 / 155

后记 / 163

绪 论

公元9世纪后期，强盛的大唐帝国因“安史之乱”而逐渐衰落，利用唐末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和回纥汗国崩溃后北方大漠草原上诸部处于分散游牧的状态，游牧于中国北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的契丹人乘机崛起。公元907年（唐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唐朝末代皇帝哀帝李祝禅位于朱温，标志着大唐帝国灭亡，朱温的后梁建立。就在同年的正月，活跃于松漠之间的契丹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如迁王集会竭，燔柴告天”，即可汗位，称“天皇帝”^①，取代遥辇氏部落联盟，成为契丹国的可汗。公元916年（辽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二月，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最终平定了以耶律剌葛为首的诸弟反叛势力，筑坛于龙化州东，在“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的拥戴下，按照中原汉制，称帝即位，建元神册，^②标志着其“变家为国”^③过程的完成。阿保机开始由一位纯粹的草原行国——游牧政权的君主，变成了身兼草原行国可汗和中原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皇帝于一身的蕃汉共主。

从开国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机，经过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

①（元）脱脱等：《辽史》卷一《太祖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页。

②《辽史》卷一《太祖上》，第10页。

③《萧瑾墓志》，载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

律璟、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至末代皇帝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辽朝共历九帝，近 220 年。在辽末乱世，耶律大石又率领部分契丹人西迁中亚，于 1124 年二月建立哈喇契丹，史称“西辽”，至末帝耶律直鲁古于 1211 年被乃蛮部落王子屈出律（古失鲁克）所灭。因这里所要探讨的是辽朝政治中心问题，故暂不涉及契丹人西迁建立的西辽。

辽朝曾先后与南方的五代、北宋对峙，和后来继之而起的金朝一起被已故的陈述先生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发展前进，起着极其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①。邓广铭先生也曾指出，辽朝“从其对中国历史以及亚洲历史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来看，却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②。

由于辽朝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面貌非常独特，在中国古代诸王朝中显得十分特殊，因而不断地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但是，因为人们对辽朝独特社会面貌的认识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了对其政治中心问题也理解不一。因此，加强对辽朝的政治中心进行研究，对于研究辽朝政治体制，进一步推进辽朝历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以及对元朝政治中心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何谓政治中心

所谓政治中心，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和观点，亦可称统治中心，是指一个政权政治活动的领导中心，即对全国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今天世界各国的首都就是所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如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乌兰巴托是蒙古国的政治中心，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

但是，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和观点是从农耕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① 陈述：《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 页。

②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之《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的工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比较适合用来分析和研究现代社会和古代的农耕社会，相对来说，对于分析和研究古代的游牧社会却有些“水土不服”。这一点早在1959年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就曾经说过，“我深切感到：我们对于前贤所作的亚洲北部游牧民族的研究，有再加检讨的必要。其理由之一，是因历史学者很多是出身于农耕社会，故其在史学上的看法，往往是以农耕社会为对象而形成。但用此看法去研究性质完全不同的游牧民族的历史，是不是妥当，似有反省的必要。”^①尤其是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原因，导致草原正在逐渐退化和消失，牧民也正在减少，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开始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渐行渐远，加之典籍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记载的缺失和偏见，使人们对传承了几千年之久的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变得生疏，甚至产生模糊的认识和误解。如近些年来，在中原地区特别流行以草原为题材的音乐和歌舞，生活在高楼大厦里的城里人和耕耘于土地上的农村人在听着草原音乐、哼着草原歌曲、欣赏着草原舞蹈，陶醉于其优美旋律、婀娜舞姿和动人歌词的同时，想象着蓝蓝的天空，朵朵白云下，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上，鲜花烂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色，认为牧民逐水草而居，吃肉饮乳喝酒，过着无拘无束的浪漫生活。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误解，草原的景色并非都是想象中那么美好，牧民的生活也充满了艰辛和劳累，毫无浪漫可言。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曾指出：“人们对游牧社会的不了解或误解，主要是由于身处于世界主要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居农业文明及相关文化下的产物。以此而言，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对于熟悉定居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我们’来说，游牧社会及其文化所造成的‘异例’（anomaly）或者‘陌生感’，挑战了我们许多既有的信念。”^②

① [日]岛田正郎：《从人类学上看辽代的文化》，载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九，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507—519页。

②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确实，以政治中心问题为例，在古代农耕政权和现代国家，都城是一个政权对全国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古代游牧政权即“行国”，上自君主，下至普通牧民，都在广阔的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产生活，不垦地种植五谷，也不兴建城郭宫室，自然就没有固定的都城，其政治中心因此应该是迁徙移动的。可是，当驰骋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首领带领下，以风卷残云般的速度冲入了农耕地区，控制了大量农业人口以后，因统治需要开始向农耕民族学习，兴建城池宫室，而统治者自己却仍然保持故有的生活传统，在草原上迁徙游牧。那么，这类政权的政治中心在何处呢？看来要解决此问题，非常复杂。辽朝的政治中心就属于这样的问题。

二、关于辽朝政治中心的研究现状

政治中心问题是有辽一代留给我们的历史谜团之一。关于此问题，目前国内史学界多数关于契丹辽朝历史的论著中，都有不同程度地论及，但分歧较大，至今没有达成一致见解。总体来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京城说”。

所谓“京城说”，即京城是辽朝的政治中心。具体来说，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清代的顾祖禹、现代的谭其骧、张国庆等先生为主要代表，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早期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古城），圣宗以后的政治中心是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如顾祖禹曰：“契丹以临潢为皇都，亦曰上京。……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①谭其骧先生依据文献的记载，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辽朝自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以后的

^①（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八·宋下”，贺次君等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5页。

一百一十多年,事实上的都城已经由上京临潢府移至中京大定府。^①张国庆先生也认为:“上京临潢府,为辽代前期的首都。……是辽中前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京大定府为辽代中后期的政治中心。”^②持此观点的还有张道贵^③、葛剑雄^④、韩茂莉^⑤、曹显征^⑥、李洁萍^⑦、李义^⑧、马凤磊和青白音^⑨、李冬楠^⑩、明盼盼^⑪、姜含^⑫等先生;二是以杨宽、林荣贵、项春松、何天明、李逸友和李宁等先生为主要代表的观点,与之稍异,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一直是上京临潢府。如林荣贵先生不同意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强调上京临潢府一直是辽朝的法定都城,辽圣宗从未正式宣布过迁都中京大定府。^⑬何天明先生认为“在五京之中,以上京地位最高,是辽政权的都城。”“从地位来讲,除上京外,都应当视为陪都。”^⑭李逸友和李宁先生在《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的商榷》一文中认为:“上京是辽朝首都,其余四都是陪都,史学界已成共识。”针对谭其骧先生的中京为辽朝后期首都的观点,从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辽中京的功能作用、辽中京的建置制度及囚禁皇室成员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此说并不成立。^⑮杨宽先生也认为“辽上京是契丹最早创建的都城,始终作为政治上的中心”^⑯。项春松先生在《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中也认为:“终辽一代

① 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载同氏:《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289页。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第43—53页。

② 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③ 张道贵:《辽后期首都应是中京大定府》,《光明日报》1980年8月12日第四版。

④ 葛剑雄:《也谈辽后期迁都中京问题——读林荣贵同志〈辽后期迁都中京说驳议〉》,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第310—322页。

⑤ 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7页。

⑥ 曹显征:《辽中期迁都中京管窥》,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25—31页。

⑦ 李洁萍:《中国历代都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⑧ 李义:《辽中京产生的原因与作用》,载《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十八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33页。

⑨ 马凤磊、青白音:《辽上京城的兴建、布局及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十八辑,第213—224页。

⑩ 李冬楠:《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第50—53页。

⑪ 明盼盼:《辽中京兴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论文,第11—12页。

⑫ 姜含:《辽代五京建置研究》,辽宁大学2011年历史地理专业硕士论文,第20—22页。

⑬ 林荣贵:《辽后期迁都中京说驳议——与谭其骧教授商榷》,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第291—310页。

⑭ 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⑮ 李逸友、李宁:《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的商榷》,载《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十八辑,第175—185页。

⑯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二百余年，上京一直为辽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往来的中心。”^①

第二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捺钵说”。

以傅乐焕、陈述、姚从吾、李桂芝、李锡厚、王曾瑜等先生为主要代表，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是游牧式的捺钵，即契丹皇帝的一年四时捺钵。傅乐焕先生在其名篇《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认为“今知其虽具五京，固非政治中心之所在”，“辽代政治中心，不在汉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钵”，“此（即捺钵）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中心机构在此。”^② 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从下述文字中可以窥见，他认为京城“在政治上也没有成为全国最高的司令台……皇帝在这个场合（即捺钵——引者注）里，主持大政讨论，裁决军国机要”^③。姚从吾先生在《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一文中认为四时捺钵是“辽朝一代的大法，君臣日常生活，国政实施中心”^④。他在《说契丹的捺钵文化》一文中进一步认为四时捺钵“既为契丹历朝皇帝春、夏、秋、冬四季，定期狩猎的‘行营’，全国政令所出的‘行在所’；校猎讲武、会议国政的重地；接见外国使臣，受纳聘礼的汗庭。”还把捺钵上升到文化层次，认为在辽朝形成了捺钵文化。^⑤ 李桂芝先生在《辽金简史》中认为辽国“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辽国皇帝“巡行于四时捺钵之中，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行踪转移。……捺钵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⑥。李锡厚先生在《中国历史·辽史》中更进一步明确认为“捺钵是整个辽朝的政治中心，不仅有关游牧各部的重大问题

①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 页。

②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同氏：《辽史丛考》，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7、94、97 页。

③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07—108 页。

④ 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载杨家駱主编：《辽史汇编》（九），台北：鼎文书局 1973 年版，第 695—752 页。

⑤ 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载同氏：《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正中书局 1959 年版，第 7 页。

⑥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000 年第 2 次印刷，第 51—53 页。